

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



波峰与波谷

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

阎步克 编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



波峰与波谷

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

阎步克 编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波峰与波谷: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/ 阎步克编著. —北京:
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1

(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)

ISBN 978-7-301-13219-7

I. 波… II. 阎… III. ①官制—中国—秦汉时代~明代—普及读物
②官制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—普及读物 IV. D691.4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0582 号

书 名: 波峰与波谷——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

著作责任者: 阎步克 编著

责任编辑: 岳秀坤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3219-7/K·0511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5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排 版 者: 河上图文

印 刷 者: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15.75 印张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本丛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
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

丛书主编

袁行霈 严文明 张传玺 楼宇烈

丛书编辑委员会

袁行霈 严文明 张传玺 楼宇烈 李 零

王邦维 邓小南 刘勇强 吴同瑞

序言 /001

- 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/001
- 二 波峰与波谷 /006
- 三 常态、变态与回归 /008

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/017

- 一 从王国到帝国 /017
- 二 “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” /025
- 三 皇帝—官僚统治阶级 /030

第二章 官僚行政体制的完善 /037

- 一 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/038
- 二 行政组织的进化 /044
- 三 军政与边防 /047

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/051

- 一 刀笔吏治天下 /052
- 二 律令秩序 /056
- 三 “以文书御天下” /062

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/067

- 一 “庶人之有爵禄” /069
- 二 禄秩的渊源和性格 /075
- 三 从禄秩到官品 /083

第五章 儒·法与儒·吏 /089

- 一 从法术、道术到儒术 /090
- 二 “奉天法古”与王莽改制 /096
- 三 儒法合流与儒吏融合 /101

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/107

- 一 吏道与功能 /108
- 二 任子与内侍 /111
- 三 察举与四科 /113
- 四 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/116

第七章 官僚阶层的士族化 /119

- 一 乡里与豪右 /120
- 二 官场与官族 /124
- 三 东汉的士林 /127
- 四 学门与士族 /131

第八章 动荡时代的皇权与门阀 /137

- 一 黯淡失色的皇权 /138
- 二 东晋：门阀政治 /142
- 三 南朝：“主威独运”及其限度 /148

第九章 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/153

- 一 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/154

二 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 /161

三 玄学清谈的政治理念 /168

第十章 集权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/175

一 空话不空：官僚政治话语 /176

二 冰层下的潜流：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/181

三 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/185

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/193

一 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/194

二 异族皇权·国人武装·军功贵族 /200

三 胡化、汉化的摇摆波动 /208

第十二章 从北朝到隋唐：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/217

一 青出于蓝：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/218

二 等级安排与身份管理的进化 /225

三 北朝政治文化风尚：重军功、重吏治、重法制 /234

四 北朝：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 /240

后 记 /247

序言

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

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。由于整套丛书的分工，本书被安排承担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制度的写作，所谓“前期”指的就是这两个历史段落。

夏商周的国家，有的学者称为“方国”，也有的称“王国”。“方国”之“方”，显示了那些形成了“国”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，“王国”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“王”，存在着王权的情况。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。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朝则开启了一

个新时代，这时候皇帝专制、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呱呱堕地了。这种政治体制，从政治学上说应属“官僚帝国”。战国到秦汉的这个历史转型，确立了两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。帝制的终结，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呢。

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，一般是要通过官僚组织来贯彻的。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，在存在专制、集权的地方，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。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，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。若干骑马民族出现过若干以严酷著称的首领，但不好说那是一种“专制体制”吧，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。当然，对传统中国政治是否是专制和集权的，人们也有不同看法。有人认为，传统中国存在相权、存在科举考试、存在士人，皇帝不能为所欲为，所以帝制中国不是“专制”的；还有人认为，技术条件限制了传统皇权，使其达不到专制和集权。这问题该怎么看呢？我们觉得，概念的界定，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。不必过分拘泥“专制”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，它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已久，约定俗成了。从世界史的范围看，中国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现象。这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。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：“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。”邓小平也承认：“旧中国留给我们的，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，民主法制传统很少。”福山的《历史的终结》一书甚至认为，由于儒学传统影响，东亚社会走向一种“亚洲新专制主义”。不同的“专制”用法虽所指各异，但总归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中国政治集权传统是最具典型性的，它一直影

响到中国当代。部分人不愿采用“专制”一词，出于对祖先的“温情和敬意”，但那也如林达先生的《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》一文所说：“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，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。它像奴隶制一样，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，一种形式”，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，方应断然拒绝专制。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，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“专制的”，由此与其他与之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，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。

在观察面对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时，我们的基本视角有三：第一，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。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，那么行政的合理化，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。比如说，它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，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，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，等等。古代政治家在“分官设职”的时候，逐渐体察到那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。那些规则也常遭破坏，比如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，或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，等等。但从长时段看，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，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。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：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，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，他不能自拆台脚。宰相所谓“相权”的背后，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。

第二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。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。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，也是一个安排身份、分配权势的架构。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“官本位”、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。官僚的位阶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

的资本。从理论上说，皇帝至高无上，集政权、法权和军权于一身，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，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各有其份额。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“作威作福”制度条文之中。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，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，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，是君臣“博弈”而达到的动态平衡。周代贵族世卿世禄，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，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；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，便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官员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，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。

王朝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官僚权贵，如文法吏，士人，士族，军功官僚，外戚，皇宗，宦官，在异族政权中还有部落贵族，等等。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。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，如文吏政治、士人政治、门阀政治、军功贵族政治、宗王政治，还有外戚专权，宦官专权，异族统治等。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，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；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，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。在王朝初年，军功集团可能拥有较大势力，但随后又可能被文官群体逐渐取代。皇宗、外戚、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。在历史前期，外戚、皇宗拥有较大参政空间，到历史后期则大受限制。宦官势力有助于君主独裁，但也会导致皇权的恶化，并使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出现裂痕。异族政权中存在着民族冲突的张力，这时部落显贵通常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，部落因素也会造成政治斗争呈现出无规则性。士族门阀具有“贵族化”的性

质，而在官僚“贵族化”了的时候，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，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。比如说，当门阀只凭门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时，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就被分割了。这里所谓“贵族化”是一个过程。一些时候官员在趋于身份化、特权化、阶层化、封闭化、自主化，这种演化最终结果是贵族化，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，或浓厚或轻微。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，会呈现不同的面貌。甚至，当官员发生贵族化时还会出现专制和集权的弱化。

说到士人，轮到第三个因素了，即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。在传统中国，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，或说士人。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，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，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；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(通过谏诤等活动)、整合社会(通过教化等活动)的特殊功能，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。由此，中国官僚政治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“士大夫政治”。当然，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，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，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，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。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，是灼然可见的。例如，它催生了那些培训和录用士人的制度，如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。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。王莽的“复古改制”就是一个好例子。总之，“士大夫政治”，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。

二 波峰与波谷

本书题为“波峰与波谷”，大致符合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。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，其帝国的规模、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，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；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：帝国面临着动荡、分裂，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、扭曲。

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，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，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。周朝的官员体制就已颇具规模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政治史的“王国”时代，就已蕴藏着专制、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。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，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。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，那么更复杂、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呼之欲出。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法家学派，其法治学说跟现代的官僚制理论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。西周春秋时诸侯国天各一方、各自为政，而战国以来各国政权都在走向集权，君主不仅公然称“王”，甚至尝试称“帝”。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《周官》，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，但其中“分官设职”的精心安排，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。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时期就没出现类似文献，可见《周官》是个很“中国特色”的东西。
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，秦始皇帝灭六国，出现了皇帝一人君临四海的局面。周代实行的是“世卿世禄”的贵族政治，汉代一变而为“布衣将相”、“选贤任能”之局；那些“世卿世禄”的古老贵族，到汉代就没什么特殊政治影响了。秦汉行政中充分利用文书档案，严

格遵循法规故事，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，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。一批训练有素的“文法吏”承担帝国政务。君主通过郡、县、乡、里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。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，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，儒家的“礼治”精神开始和帝国的“法治”结合起来，“经明行修”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，与文法吏并立朝廷。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，由此确立了“士大夫政治”。这种“士大夫政治”，在历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态了：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，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，他们受过“六艺”和“礼乐”训练。这种“礼乐文化”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。

在这个时候，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“常态”。“常态”指什么呢？就是皇帝专制，中央集权，官僚政治，儒家正统，和“士大夫政治”。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，在秦汉汹涌澎湃，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。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，初具规模，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。

魏晋南北朝就不一样了。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，其后是三国分裂，皇权低落，政治动荡，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。统治集团封闭化了，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。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，此期演变成为一个士族门阀阶层。儒学低落，玄学清谈和佛教、道教流行开来，它们以某种形式、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。西晋的短期统一，被北方民族打破。东晋偏安江左、皇权微弱，门阀显赫，获得了与皇帝“共天下”的门第特权。由此所造成的政治“变态”，使中国历史的另一

些可能性，由此显露出来了，例如学者所说“封建化”、“贵族化”等等。而“五胡乱华”和十六国林立，又使中国北方陷入了动荡，少数民族的部落显贵活跃于时，部族因素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变形，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政治的“变态”。凡此种种，都使这个时代呈现为一个帝国的低谷或曲折。

然而低谷和曲折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进化迹象，像三省制的进步，察举制的进步，位阶制度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，等等。在走出低谷之后，隋唐大帝国来临了。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汉，同时又更上一层楼，像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制、《唐律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显示的那样，而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，就构成了汉唐间制度进化的阶梯和环节。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“变态”，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，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？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：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，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，和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。由此，所谓中国的“中古”，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。蛮族南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，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。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，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，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“轴线”。

三 常态、变态与回归

秦汉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政治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呢？一种看法，

把战国至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端。这个“发端”，与战国间的巨大历史转型合拍了；而汉晋间所发生的，则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较小变动。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学者，则认为秦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，魏晋南北朝才是“封建化”的时代。那么汉晋的社会变动，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。这些“封建”概念，都可能与政治学意义的“封建”发生冲突。还有一种分期模式，认为秦汉以前属古代，六朝属“中世”，其特点是“贵族政治”；唐宋间再度发生“变革”，由此进入了“东洋的近世”。如果说“魏晋封建论”只凸显了对中古的“进入”的话，“六朝贵族”和“唐宋变革”既凸显了对中古的“进入”、又凸显了由中古的“走出”，从而为解释唐宋间的各种变迁提供了框架，因此特别受到了唐宋研究者青睐，尤其是在各种“封建论”后继乏力之时。对同一历史进程，从不同视点能看到不同景象。各种分期之说都推动和深化了相关认识，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学术积累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句话说得很好：对历史最好的理解，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。确实，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大量重要收获，都是在“分期论”的引导之下做出的。

田余庆先生的著作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在叙述魏晋南朝政治史时采用了“变态”与“回归”的用语。士族门阀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，而在田先生看来，以“门阀与皇权共治”为特征的“门阀政治”只是“皇权政治的变态”而已，它来自皇权政治，最终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。这其中包含着一个“变态—回归”的叙述模式，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引出了“常态”的问题。“常态”、“变态”、“回归”这些概念，为人们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，提供了启示。

中国历史的连续性，在较早时候是被称为“停滞”的。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时，他们感觉，这个帝国从早期到晚期好像没多大变化，于是就产生了“停滞”的说法。亚当·斯密、黑格尔都有过“中国停滞”之说。“停滞论”在20世纪低落了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中国历史前后期的各种变迁不断被揭示出来，“传统—现代”成为观察历史的基本参照系，“停滞论”被“分期论”取代了。不过“停滞论”虽有不当但却不是向壁虚构，它也是基于一定史实的有感而发。这在20世纪，更多地被表述为“连续性”。与“停滞”不同，“连续”的提法不含贬义，可以容纳“发展”和“变迁”。余英时先生指出：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，从商周到明清、直到今天，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，它在秦以后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；此后只有“传统之内的变迁”，除了秦与近代，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。为此余先生提示要多研究中国政治史，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，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。

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，皇帝—官僚—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，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，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，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，连续发展直到明清。所谓“二千年之政，秦政也”，所谓“百代多行秦政法”的说法，表达的都是类似的“两千年一贯制”的观感。所谓“连续性”的提法，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。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？除了种族之外，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，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，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，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。从“连续性”考虑，其变迁主体是包括思想